

陕西军政府与辛亥革命

冯峰

(长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鉴于现有研究的泛泛而谈和未有令人满意的阐发,分析了陕西辛亥革命成立的军政府组成中各方势力的角逐、博弈以及军政府的施政方针与策略。分析认为,军政府建立在新军、会党、留学生和同盟会的联合之上,但是会党、新军掌握了大权,同盟会则处于边缘地位;军政府树立“反满主义”,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不同措施筹粮、筹款,都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施政风格。

关键词: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陕西军政府;哥老会;张凤翔;井勿幕;留学生;同盟会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3-0026-07

陕西是辛亥革命中最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武昌首义后12天,即1911年10月22日,陕西的革命党就在西安发动了起义,10月27日秦陇复汉军政府(以下简称军政府)正式成立。在军政府的领导下,革命军成功地击退了清军东西两路的疯狂进攻,从而有效支援了河南、山西、甘肃邻省的革命,而且在失去与外界通信的不利条件下,完成了陕西的光复与省内政治、经济各项事务的稳定。因此,研究陕西辛亥革命必须研究陕西军政府。

然而,笔者目前所见的几本陕西辛亥革命的著作,有关军政府的内容多泛泛而谈,且大同小异,^①对于军政府组织中新军、留学生、会党等各方势力的角逐、博弈,未有令人满意的阐发,因而对军政府在省内革命中的艰难与转折,以及陕西同盟会的革命策略,均缺乏了解。

一、军政府的社会基础

我们考察陕西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发现,同盟会与3种社会势力的合作是一个显著的现象。这3

种社会势力分别是会党、新军与留学生。起义后成立的军政府也形成了同盟会与三方势力的代表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这几方势力分别在革命的准备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一,会党。近代陕西最大的帮会是哥老会。哥老会的地域分布,陕北最少,关中次之,陕南最多。哥老会有严密的组织,称为“山堂”(下设叫做“四柱”的组织),其成员叫做“兄弟”。根据一份有关哥老会的调查报告,山堂的具体数量虽然很难统计,但主要的有太白山、提笼山、秦凤山、定军山、琥珀山、贺兰山、通统山等,分布在关中石泉县、华阴县、凤翔县,陕南勉县以及陕北三边、内蒙边境的地区^[1]。从这些山堂分布可以看出,哥老会深入到基层的乡村社会中,能够吸收来自社会底层的游离势力。而在清末社会大变局中,哥老会成员也逐渐由乡村走向城市,如大量的哥老会成员加入新军,进入省会发展

^① 有关陕西辛亥革命的研究,可见孙志亮等编《陕西近代史稿》第9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孙志亮、张应超《陕西辛亥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主编《陕西通史》第7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收稿日期:2013-03-16

基金项目:长安大学创新团队项目(2013G6111005)

作者简介:冯峰(1977-),男,陕西延安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势力。在陕西革命中呼风唤雨的哥老会成员张云山,在会中地位虽然不高,但是一开山堂就发展了一千多名兄弟,大多为新军,其他如朱福盛、吴世昌、万炳南、马玉贵、刘世杰等哥老会头目也在新军中大力发展兄弟,权倾一时^[1]。他们在新军的相应建制中渗入自己的组织,从而改进了以山堂为主的结合方式,成功地控制着新军中的兄弟。^① 兄弟加入新军使哥老会在合法的庇护下发展了组织。

第二,新军。清廷戊戌维新前后直到清代灭亡,仿照西法编练新军,陕西新军的组建与之大体同步。1898 年,陕西巡抚魏光燾上奏在陕西编练新军。1902 年,巡抚升允奉旨,在陕西编练常备军 6 个营,驻扎省城,其余编成续备军和巡警,驻扎省内各地。1905 年,巡抚曹鸿勋招募新兵,到 1906 年已有“步兵一协,炮兵一队,驻省城,官二百二十员,兵三千九百三十六名”。1910 年陕西新军共有步兵两标,骑兵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炮兵两队,组成陕西陆军混成协^[2]。陕西新军至此已初具规模。新军官兵可分为 3 个阶层:上层军官为一个阶层,大多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由于有留日经历,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具有较强的革命意识。如军政府大统领张凤翔,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任二标一营管带;张益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二标三营管带,他们在革命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中下层军官多来自国内的保定陆军学堂,如新军队官彭安世是保定陆军学堂毕业;新军队官钱鼎也是保定陆军学堂毕业,他们往往成为新军上下层之间的联络枢纽,如钱鼎就具有哥老会和新军的双重身份。下层士兵则大多为哥老会兄弟,吴世昌、万炳南、马玉贵、刘世杰都是队正目,张云山是协司令部的司号官,朱福盛为某队伙夫,陈殿卿是某队护兵,只有马福祥是队官^[1]。这 3 个阶层都是清政府潜在的反对力量。

第三,留学生。清末“改科举、派留学”的教育改革,促成了出国留学的热潮,当时清廷公派学生留日,因此青年首选的去向是东邻日本。1904 年开始,陕西先后从省武备学堂、高等师范学堂和三原宏道学堂选派优秀生赴日留学,首批公费生 31 人,自费生 18 人。1906 年全国留日学生达到八千多人,陕西籍五十余人。虽然占全国的比例少于其他省份,但陕西籍留日学生还是积极参与了留学界的学生运动,宣传了革命思想。如井勿幕先后从黄兴、秋瑾等革命党游;1905 年,白毓庚参与了反对日本文部省《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并被推为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1906 年,于右任筹款创办《神州

日报》^[2]。此外,陕西籍留日学生通过创办《关陇》、《夏声》等刊物,倡导启蒙思想和爱国精神,报道省内抗捐、抗税、保矿、保路消息,抨击清政府和帝国主义。^② 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洗礼后,陕西籍留学生纷纷返回省内,成为各行业的精英。尤其是官派留学生学成归来后,或在新军任高级军官,或在省内教育、农商、法政各部门任职。《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34 收有一份陕西籍留日学生毕业名单,有日本士官学校、振武学校毕业生,有明治大学法政专业毕业生,有日本农科大学毕业生(其中法政专业的最多,他们大多通过了宣统三年的学部考试,获取法政科举人),在省内各部门已担任要职^[3]。而陕西革命爆发后成立的军政府中,留学生承担了财经、政务、教育、民政等部门的职责。

同盟会在革命准备期成功地联络了上述三派势力。应该说,同盟会早期的主要成分是留学生。1905 年同盟会成立,陕西籍留日学生三十多人加入了同盟会,同年井勿幕、张钫等人回省内进行革命活动。尤其在井勿幕的努力下,1906 年春,同盟会陕西支部已有会员三十多人,但在发展会员上仍以知识阶层为主,拒绝吸收陕西境内颇有实力的新军和会党,故影响有限。1907 年,井勿幕二次返陕后,听取幕亲会吴虚白的建议,改变策略,决定联合新军、会党。1907 年重阳节,井勿幕等人代表同盟会与幕亲会祭祖于黄帝陵,1910 年夏同盟会又与哥老会于西安大雁塔歃血会盟^[1-2]。这两次会盟,同盟会都充分吸收了会党祭祖、拜关帝、兄弟宣誓等结义形式,很好地将同盟会的十六字方针与会党的宗旨结合起来,得到了会党的鼎力支持。同盟会还鼓动新军的革命意识,1910 年 11 月,同盟会彭仲翔、张光奎等人联络军界人士,举报督练公所王毓江贪污受贿等十大罪状。王毓江乃巡抚恩寿的亲信,握有陕西陆军混成协的实权,压制中下级军官,广设密探,操纵新军士兵。此次举报因陕西咨议局的支持,最终上达清廷陆军部、资政院,恩寿在清廷的压力下被迫将王毓江解职,而张凤翔、张益谦等同情革命的新军将领渐次升级,得以掌握实权^[4]。

① 如新军标一级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这样“舵把子”可以操纵来自不同“山堂”的兄弟。见《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262 页。

② 《关陇》的宗旨是“提倡爱国精神,浚渝普通知识”,见《关陇杂志社出版广告》(《夏声》第 5 期)。《夏声》则“以开通风气,涤除弊俗发挥固有文明,灌输最新学说,鼓国民独立之精神为宗旨”,见《夏声杂志社出版广告》(《关陇》第 4 号)。有关《夏声》、《关陇》的介绍,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3 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411-425 页。

总之,在陕西辛亥革命的准备期,同盟会、会党、新军、留学生进行了有效的革命活动,建立了联合战线,因此,革命爆发后成立的军政府自然由来自这4个集团的人物所组成。

二、军政府的组成及各方势力的博弈

武昌首义后,陕西各革命阶层已开始秘密筹划起义。九月初一(公历10月22日)召开的林家坟会议,决定当日起义,出席者有张凤翔、钱鼎、张云山、万炳南等新军、哥老会三十余人。张凤翔出任起义总指挥,钱鼎出任副指挥。张氏当选得到了钱鼎的大力支持,钱鼎出于哥老会,后加入新军,为张凤翔下属,所以他对张氏的支持也让哥老会张云山、万炳南等人不敢提出异议。而陕西同盟会最重要的人物井勿幕此时却在北方策动革命,不在省城,实际上决定了起义后军政府的领导权在新军与会党手中。

起义进展顺利,起义军占领了军装局,攻下满城,驻西安的清廷官员或死或伤、或逃逸、或被俘,省城战事很快结束。此时哥老会掌握了省城的实权:首先,在清政府的统治崩溃以后,哥老会成为省城最有组织的集团。尤其新军建制解散之后,哥老会在新军中所建立的“舵”,成为有效的军事组织方式。各“舵”的兄弟对哥老会头目惟命是从,而不服从革命军的指挥。其次,在战斗中,哥老会为攻城主力,获取了大量武器;又乘机扩大队伍,招揽兄弟,起义后队伍扩到30个标,而大多在哥老会手中^[1]。这让哥老会主要成员的权力欲开始膨胀。

当时,哥老会最重要的两个头目是万炳南和张云山。九月初四,起义军在军装局召开会议,推举张凤翔为大统领,钱鼎为副统领,引起万氏的不满。当时万炳南的属下宣称,“我们只知有万大统领,不知有什么张大统领”。在万氏的谋士陈同(浙江人,同盟会会员)的怂恿下,万炳南要求取代张凤翔做大统领。第二天,陈同到军装局声称,只有万氏才有资格做大统领,遭到陈殿卿(哥老会兄弟,张凤翔的护兵)的呵斥,怀恨而去^[1]。哥老会与新军面临着分裂,郭希仁遂出面进行调节。

郭希仁是临潼人,清举人,曾东游日本,接受革命思想,归国后开始秘密从事革命宣传。1908年,创办丽泽馆,为同盟会秘密集会场所,该社还组织演讲,发行《丽泽随笔》。1909年又创办声铎社,1910年办《声铎公社质言》,开启明智,宣传反清思想。

郭氏被选为陕西省咨议局副议长,并将咨议局发展为革命的一个重要基地,弹劾督练公所王毓江即出于他的策划。陕西革命前,郭氏还积极与井勿幕等人筹划革命形势,以咨议局为据点,联络会党人士^[1]。郭氏系地方士绅出身,而投身革命,故能够成为士绅阶层与革命派之间的纽带。当哥老会和新军发生矛盾时,他凭借在地方的声望,充当了调解人。

郭希仁对陈殿卿、张云山、马玉贵等人进行了劝说。马氏亦为哥老会兄弟,徒众欲推他为兵马元帅,经郭希仁开导,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九月初六,在咸宁署内再次召开会议,推举革命的领导机构。郭希仁和张瑞玘(清进士,历任韩城、兴平等县知县)出面,以太平天国内讪为鉴,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共度艰局。最终,大家一致支持张凤翔,于是张氏表示:“既然大家要我干,我就勉为其难,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万炳南见人心向背,于是也表示支持张氏,为了拉拢万氏,众人也同意他担任副大统领。然而,此次人事安排还是引起了张云山的不满,时张云山在高等审判厅,竖起“洪汉”旗帜,大肆招兵买马,俨然形成了高等审判厅张云山、督练公所万炳南与张凤翔复汉军政府的对峙之局^[1]。

为了安抚哥老会头目,军政府于是设立了六大都督:以张云山为兵马都督,吴世昌为副都督;马玉贵为粮饷都督,马福祥为副都督;刘世杰为军令都督,郭胜清为副都督。军政府又笼络哥老会内资历较高的朱福胜为四路总查,考察、检举官员。张凤翔这样安排是为了让哥老会的主要头目互相牵制,果然哥老会的四大势力,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各树一帜,不相为谋。军政府通过六大都督的设立,暂时平息了哥老会的分裂趋势,但代价也是明显的,立下赫赫战功的新军出身的张宝麟、张钊、曹位康、张光奎,以及同盟会会员党自新等人都在军政府中没有位置。而省城虽然革命胜利,各地方秩序却面临崩溃,土匪、刀客、哥老会乘机大肆活动,于是军政府又派出四路招讨使,稳定地方秩序。因为井勿幕革命前已先行北上,由其任北路安抚招讨使,新军的张宝麟任南路招讨使,新军的曹位康任西路招讨使,钱鼎以副统领兼东路招讨使。招讨使为新军、同盟会所掌控,以免地方亦为哥老会所占据^[1]。

但是,这仍无法阻止哥老会在地方扩张势力。张云山热心于扩充哥老会,任兵马大都督后,更利用职权之便,在交通要道和州县遍设“码头”,办理军务之余,甚至理诉讼、设私刑、派款项,处理民政,凌驾于地方官之上。他发布盖有兵马都督关防印章的

告示,还必须加盖“洪会公议”戳记,方能生效。军政府为了限制张云山乱设“码头”,通过一个创设“码头”的“章程”,但收效甚微。随着东西两路战事紧急,张云山在西路战事中立下战功,获得军民好评,满足了他想当“名将”的虚荣,此后遂在军政府诸人的劝阻下,主动取消“码头”,改为民团^[1]。

军政府成立之初,军事固然是重点,但是民政事务亦需要处理。在这方面,新旧知识阶层(士绅和留学生)就大有用武之地。九月初七,军政府迁往高等学堂后,张凤翔即委托郭希仁筹划扩大民政府。郭氏遂以王锡侯和张瑞玘为副手,王锡侯乃清末陕西咨议局议长,张瑞玘为前清进士,历任数县知县,有总理各项政务的丰富经验;又令张密臣、孙玉溪办理财政、开办银行,张西轩、曹澍经管学堂,王藻泉、刘春谷经管实业,党积龄、钱鸿钧负责司法。其中曹澍是留日学生,党积龄、钱鸿钧都是日本明治大学法政专业毕业生,张西轩是同盟会会员,其他4人身份虽然无法确认,但无疑是来自工商界的人士,最可能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是士绅或留学生,因此他们应该也属于知识阶层。

十月初二,军政府从高等学堂迁至北院后,再次改组。此时,军政府派出的两路人马,抵制了清廷的初次进攻,军事上初步站稳了脚跟。起义已有一月,省内各项民政事务急需开展,社会正常秩序亟待恢复,郭希仁乃与彭世安、李元鼎等人商议扩大民政府。于是决定另组机关,改军令府为军政部,专理军事,将民政府与参谋处合并,改为总务府,综理军民各事。总务府内设参政处、参议处、秘书厅、铨叙局,参议处主议论筹划,参政处主执行,秘书厅专办文牍函件,铨叙局专司遴选州县官事宜。又下设军政、财政、民政、司法、外交、实业、教育、交通八部^[1]。这样,政府的组织形式已初具文官政府的特点:第一,起义初起时,军事为要务,因此军令府、参谋处的地位显要,而参谋处被裁撤,军令府的地位也由直属大统领降为下属总务府的军政部,此军事组织的升降已表明军务在军政府中的重要性相对降低。第二,财政、民政、司法、外交、实业、教育、交通等7个部门的新建,已表明政府分工协作的“科层制”特点,这正是文官政府的基本要素。第三,由于新政务部门建立,会党、新军出身者在政府中所占比例下降,而士绅、留学生的比例大大增加。笔者将新政府中任职人员的背景作了统计,从大统领到总务府各处、厅以及8个部的正副部长,共29人,其中新军8人,会党1人,士绅3人,留学生10人,工商教育界人士3

人,另有2人属于读书人(常自新、杨鼎臣),身份不明者1人(周绪福)。排除身份不明者,以28人计,则新军、会党共9人,占总数不到1/3,士绅、留学生、实业家占到2/3以上,尤其留学生就占到总数的1/3强,充分说明了此政府的确以文人、专家为主。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六大都督仍由哥老会把持,但即使算上这6人,哥老会在政府中的地位也是在下降的。

但是也能看出,同盟会在军政府中地位并不重要。起义前四处奔走宣传革命的同盟会陕西分会主要人物,如井勿幕、焦子静、景定成、李仲三等人,或未参加军政府,或在军政府中不过是边缘人物。井勿幕出任北路招讨使,显然没能进入军政府的权力核心;景定成是协助井勿幕创办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主要人物,但他实际是山西人,武昌首义后出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长官;创办了公益书局、健本学堂宣传革命的焦子静,也未进入军政府,而是出任渭北民团使,召集游侠,保卫地方;曾积极联络刀客的李仲三,只是继任了东路招讨使。上述军政府29人名单中,革命前加入陕西同盟会者,只有宋元恺、曹澍、南兆丰、高祖宪、郭希仁5人,所占比例很小,而且大多不在关键职位。陕西革命后,从上海赶回陕西的张奚若对军政府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观察:“(军政府)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手中。四个都督好像全是哥老会的,……张凤翔没有实权,财权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郭希仁在张凤翔下面做个秘书长之类的事,终日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戏称他为‘郭丞相’。此外又设了四个参议……每天批公事,什么实际的事情也不管,李子仪(元鼎)、茹卓亭(欲立)终日在做批公事的参议。”^[1]

张奚若与井勿幕、李仲三相熟,革命前曾赴日本筹办军火,而此时返回省城的张氏在军政府中见不到同盟会诸友的身影,因此才有此感慨。同盟会起义前四处奔走、起义后在军政府中无足轻重的尴尬地位,可见一斑。

三、军政府的施政方针与策略

讨论军政府的施政方针和策略,须对军政府的处境有两点基本认识:第一,陕西革命为最早响应武昌首义,因此革命形势也最为凶险。关中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帝王霸业所系,退可以联络陇右,进可以出潼关进驻中原,因此陕西一爆发革命,清廷极为重视,调集邻省兵力大举“剿杀”。而陕西的东西邻

省甘肃、河南皆在清廷统治下,未能有力援助陕西,致使军政府不得不腹背受敌,勉力支撑。第二,自省内革命伊始,与外界通信中断。与湖北革命党方面失去联系,只好独自为战,这也影响了军政府的施政。这里且举两例:一是革命党攻克南京后,起义各省代表齐集南京,选举成立临时政府,当时由于邮电不通,陕西军政府无法派出代表,由于右任在民立报馆召集旅沪同乡会,选出于右任、赵世钰、马步云、张蔚森4人代表陕西^[1]。二是在清帝已宣布退位之后,由于消息不通,军政府在东西两线,仍陷入与清兵的鏖战,损失惨重。

在此背景下,军政府只好审时度势,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制定施政方针,以下分3个方面叙述。

(一) 建立统治秩序

为了赢得民心,军政府首先竖起“反满主义”的大旗。10月24日,张凤翔檄文谴责:“满洲政府,虐待汉人,于今两百六十余年。糜我血肉,剥我脂膏,惨戮我父老,荼毒我子弟。”10月26日安民告示云:“胡满入关,皇汉失驭,肆二百余年之酷毒,苦八百余万之生灵。关辅之脂膏无余,河岳之生灵悉变。”又劝降陕甘提督张行志云:“夫自弃根本不可为义,仕宦虏廷,良非良已,苟能反正,原不能以贰臣律,何者?胡虏本非明比也。”以张行志归降符合反满大义。下令百姓可以搜捕省城旗人送交军政府,1912年1月18日,又鉴于有旗人为清廷奸细,令所有省城旗人限三日内一律出城,自谋生路,可见对旗人态度。又号召民众剪辮发云,“今者……衣冠文物大复汉官之旧,而独留此背后一物,为全体累,以致外人有豚尾之诮”,张云山的一个谕民檄文中以黄帝纪年,皆标举“复汉”宗旨^[3]。以上“反满复汉”的各种政策目的都是要建立军政府的“合法性”。

军政府还采取种种措施稳定各社会阶层。10月23日,张凤翔发布告示,确立施政方针:“第一保民,第二保商,第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24日告诫商民,“各安本份。若有土匪,抢劫奸淫,派队巡缉,立斩不容”。10月26日发告示,宣示要与外人交好,严禁仇视洋人,希望“回汉畛域悉化,耶摩宗教咸安”。11月10日,发令禁止借搜捕旗人扰乱秩序:“如有藉搜旗人名目扰害安掠者”,严惩不贷。11月11日,又专门晓谕哥老会兄弟:“所有教堂洋人,自应认真保护。汉回人等都是善良百姓,不得骚扰。”^[3]总之,除了“反满”之外,其他不同信仰、不同民族者(包括外国友人),皆在军政府团结之列。

陕西革命后,重建秩序最大的威胁是各种社会

边缘势力,如土匪与会党。起义第二天,省城即有土匪乘乱大肆劫掠,军政府命朱彝铭组成稽查处,在大街小巷巡查,遇不法之徒情节严重者就地正法。哥老会张云山亦带队出巡,当场处理一批违法之徒,省城治安稍有恢复。不过地方上土匪和刀客仍极其猖獗,清廷的上谕中提到“闻陕西匪徒扰乱治安,肆意残杀,并有伤害洋人情事”,又说“陕西土匪分窜,界连豫省”^[5],清廷的上谕当然有不实之处,但是当时土匪因两军对垒而活跃于陕、豫两省,屡屡杀害洋人,应属实情。为了恢复地方秩序,军政府派出四路招讨使,对于各种社会游离势力加以收编和利用。如井勿幕到北山,就聚集了游侠和刀客,组成6个营的兵力。至于哥老会的问题颇为复杂,省城革命成功后,各地哥老会纷纷设立“码头”,一方面支援革命,如安康哥老会兄弟高庆云、胡云山在南路招讨使张宝麟到来之前,已杀死了总兵,扣押了知府和知县,但因此也扩大了哥老会的地盘,使得地方秩序落入他们之手^[1]。张云山还多次下令告诫手下的哥老,严禁四处劫掠,说明哥老会也参与了对地方秩序的破坏^[3]。哥老会的势力,到了民国初年才逐渐被打压下去的。

(二) 筹划东西两路的战事

革命军所使用的主要是军装局的武器,军装局的武器大多是左宗棠西征时使用过的。局内最多的是来复枪,洋式武器有俄造水连珠、德造曼利夏、英造哈几克司、日造一响毛瑟、五响毛瑟,又有七子复膛、利明屯、洋抬炮、小钢炮、马枪等十几种,其他如盔甲、马甲、刀矛、土抬、红衣炮也存的很多。比较新式的武器则有汉阳兵工厂造的五响枪,局内存有10 000支,新军有3 000支,满城骑兵有8 000支,起义后分发给各部队。有人使用铡刀,革命军就有铡刀队。据张钫的估计,大概军中有4成快枪、4成杂枪、2成铡刀^[3]。这是武器的基本情况。至于革命军数量,起义前陕西有新军1个协,约五千人,起义后发展到三十多个标,每标1 500人,还有19个独立营,炸弹队、铡刀队以及招揽来的豫西豪侠王天纵、丁同声的队伍,共约七八万人^[1]。

当时,清军从东、西两线合围陕西。东线革命军主要对手,先是河南新军王钰锦的五十七标,后又从北京增调毅军马步炮兵计18个营,由赵倜率领,加上马金叙率领的河南巡防队10个营。^①毅军训练

① 这是张钫的说法,见《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6页。一说赵倜毅军号称14个营,马进叙的河南巡防队18个营,以及河南陆军1个协,但实际上赵倜只有毅军4个营。张钫为东路统兵将领,他的说法应该可信。

有素,武器先进,是革命军的劲敌。军政府方面,先派副统领钱鼎督师潼关,管带张建有、李长胜迟迟不到,钱鼎仅带领学生队二三十人出发,结果不幸遇害;后派张钫为东路都督,指挥东路战事,但新编成各标都掌握在哥老会手中,难以管理,且缺乏战争经验;最后决定派出第三标郭锦镛和炮兵营魏进先的部队,郭、魏二人在新军是张氏下属,又同是河南人,便于协作;又增派张建有、李长胜两营归张钫指挥,免除其罪责。一路上,张钫鼓励沿途各县兴办民团,以备增援;到渭南,又赦免了杀害钱鼎的该县民团长严纪鹏(刀客出身),令其随军效命;又积极联络河南起义的会党王天纵、丁同声的几千人马,在敌后以为牵制^[1]。正是张钫的有效策略,保证了革命军在东线,可以抵抗占有优势的敌人。既使如此,东线战事仍极为惨烈,潼关 3 次失守,革命军伤亡惨重。

西线革命军的主要对手是陕甘前总督升允。升允本已卸任,革命起事后,为陕甘总督长庚保举任陕西巡抚,于是启用回族总兵马安良,招募回兵 14 个营,又驻守固原的陕甘提督张行志会同作战,分南北两路,升允任北路,由泾州东进,节制马安良、陆洪涛等 23 个营;张行志任南路,由陇南东进,帅壮凯军 16 个营、铄锐营 5 个营。军政府派兵马都督张云山督师西线,指挥长武、三水、乾州一带的战斗;又派兵马副都督吴世昌主持咸阳军事,粮饷都督马玉贵把守泾阳,陈树藩、井勿幕、朱彝铭等配合作战;又副大统领万炳南驻关西重镇凤翔,统兵将领多为哥老会。西线战事也极为惨烈,升允在清帝宣布退位后,仍拒不和谈,极为残暴。而敌军一度抵达泾阳、咸阳,逼近城,军政府甚至有迁出省城之议。因此哥老会头目和新军的精诚合作,对西线战事贡献很大^[1]。

(三) 财政措施

军政府的财政措施,可分为两方面:一是稳定陕西的金融秩序,一是财政的支出与收入。

起义后几天,所有票号、钱庄关门停业,旧日纸币无法兑现,民心惶惶。军政府为了维持币制,于省城粉巷设立粮食平糶处,收集粮食十几万石,准百姓以钱贴(纸币)公平交易,因而初步稳定了民心。但直到九月中旬,各钱庄仍不能开市,导致市面冷清,影响了民众日常生活。军政府遂与商会协议,决定把大清银行改为秦丰银行,所存大清银票加盖“秦丰”印章,陆续发行 200 万两,流通市面,但市民持观望态度,收效不大。九月下旬,各钱庄陆续开业,民众掀起挤兑风潮,纷纷提取存款,军政府又于 11 月 20 日颁布整饬金融办法 5 条,限制提款条件,此后挤兑风潮稍有平息。但因为纸币与现钱交易差价

太大,民众纷纷提取现钱,秦丰字号仍不时发生挤兑,军政府又于 11 月 23 日规定秦丰钱号兑钱时间,每日上午 8 时至 11 时为军人、各公所兑换时间,每日下午 1 时至 5 时为民众兑换时间。又于 1912 年 1 月,议决“无论还债、归款、买卖、现银、百货,均以现钱贴票各半通行”,才逐渐稳定了金融局面^[3]。

但商人金融家极力抵制军政府的金融举措。政府发行的流通券之所以无法有效流通,就是山西的票号从中作祟。当时市面流通的银元、铜元极少,物品都大量掌握在地主、行店、贩运者、囤积者手中。由于交通闭塞,商人却利用电报邮政而囤积居奇,赚取暴利,金融家对政府的征借举措,百般抵制。至于货币,银色上有库平、市平的不同,制钱有大小之别,因此兑换时钱数上有三七、二八、一九种种折扣^[3]。这些都是摆在军政府面前的难题。

军政府的财政可分为支出与收入两项。支出方面,主要是军事开支,东西两线战事紧急,军马、粮草急需筹集,因此财政上压力极大。其次则是军政府日常开支、政府人员的薪饷。为了渡过财政难关,军政府一方面节约开支,一方面尽量扩大财源。节约方面,如规定军政府公务人员,无论级别每人每月一律只支取生活费银 5 两。收入方面,占领清藩库,接收银七十多万两,^①这极大地支援了最初军政府的开支,但起义后粮赋、厘税无法收取,大约不到两月,此项收入已用尽。又将各处当铺“皇本”(清政府把一部分公款存放当铺生息,称为“皇本”)没收,得银约六十万两。又饬财政部发行公债 200 万两,借贷于民,然而实际只发行了第一期 20 万张,每张银 5 两,派人赴关中各县劝捐,应者寥寥,第二期公债随之停办。又整顿厘税,命康炳勋督办西路财政,征收土药(即鸦片)税,每土药百斤抽厘金 100 两,收经费银 15 两,每月可得银三四万两。又 1912 年春,西路战事仍未结束,于是财政部提前征收本年粮税,规定于正月十五开征,至迟于四月底完征,每迟一月加征数钱,以为惩戒。又发行彩票,原拟每月发行彩票 1 万张,每张银 2 两,但商民购彩并不踊跃,只举办了一次,就不了了之^[1]。

为了筹集粮草、军饷,军政府成立筹饷局,向富商大户劝捐。当时,关中号称富庶,西安、三原多豪商大贾,如东里的刘三省堂在四川开当铺三四十家,泾阳吴怀先有扬州盐号多家,号称陕西首富。于是委任张益谦为筹办全省财政大使,赴三原、泾阳向

^① 郝朝俊(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郭希仁都说是七十余万两,张钫说库内存银 350 万两(《辛亥革命在陕西》,第 522 页),张氏所记有误。

吴、刘两家劝捐,结果只得不到十万两。此外,渭南板桥常家、泾阳社树姚家、王桥柏家,认捐也不多。又委张光奎为东路筹饷大使,到东路各县劝捐,成绩亦不理想,还引起富户怨恨,军政府遂停止劝捐。至于军队的粮食,军政府令在驻军地设立粮台,日用伙食、马干概由粮台供应。关中盛产小麦,各县公仓、富户以及普通百姓,都有存粮习惯,粮台即征用存粮,蒸成馒头和锅盔,供应前线。因此,军粮问题很快解决^[1]。

军政府的各项举措,无论是树立“反满主义”、稳定社会秩序,还是动员各种社会边缘力量抵抗清军,以及审时度势采取不同举措筹粮、筹款,解决财政困局,都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施政风格。革命虽然需要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但革命成功后,新政权之建立与稳固,却需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好各种问题。从陕西军政府的作为,我们应该能够体会这一点。

四、结 语

第一,陕西军政府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新军、会党、留学生和同盟会的联合之上。这几种社会势力在革命爆发前,已开始积极地从事反清的斗争。因此,陕西军政府成立后,自然主要来自这几个阶层的杰出人物所组成。即使以全国视野,辛亥革命的成功也主要依靠了这几种社会力量,陕西的情况不过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第二,这几种社会力量在军政府中所占的地位却并不相同,会党无疑掌握了军政府的大权,新军虽

然也很有实力,但不得不仰仗会党。旧士绅和留学生在军政府中主要承担了文官的角色,但是在军事稍定、政府向民政转移的趋势下,也发挥了必要的作用。而且旧式士绅在新军与会党对立的时候,还扮演了调节人的角色,避免了军政府的分裂。至于同盟会则在军政府中处于边缘地位,我们常说同盟会代表的资产阶级领导了辛亥革命,然而各地辛亥革命的情形告诉我们这恐怕不是实情。

第三,虽然处境艰难,军政府仍以现实主义的施政风格稳定了大局。如以六都督制约和笼络哥老会,结果在东西线战事中,哥老会的队伍立下大功。又如对各种社会边缘势力,刀客、地方民团首领的利用,也有效支援了前方的战事。在当时情景下,树立“反满主义”的大旗,确立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以各种审时度势的举措稳定财政局面,都为民国初期军政府的继续执政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 [1] 政协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 [2] 孙志亮,张应超. 陕西辛亥革命[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 [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辛亥革命在陕西[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 [4] 邵宏谟. 辛亥革命在陕西[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 [5] 中国史学会. 辛亥革命:6[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Shaanxi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1911 Revolution

FENG F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studies up to now are too general without detailed illustration, the struggle and gambling among various powers in Shaanxi military government, the policy and strategies of the government were analyzed.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Shaanxi military government was set up on the union of the army, gangs, students abroad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gue but the gangs and army held the power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gue was in a marginal position.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held anti-Manchu doctrine, maintained the social order, and took measures to raise grain and funds, which reflected the realistic style of governance.

Key words: 1911 Revolution; Wuchang Uprising; Shaanxi military government; Gelao society; ZHANG Feng-hui; JING Wu-mu; student abroad;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gue